

恒道

第二辑

鞠曦 主编

◎ 吉林文史出版社



恒 道

第二辑

鞠 曦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Hengdao Dierji
恒道第二辑

鞠 曦 主编

责任编辑:李岩冰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长春市康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数:1—2000 册

18.5 印张 54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ISBN 7—80626—214—8/C·82

编者前言

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应当认为,问题产生于所陷入的文化误区。由于文化的本体是哲学,因此,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最终应归结为哲学问题,人类所陷入的文化误区最终应归结为哲学误区。

文化存在的问题,使人类进行不断的理性探索。把人类文明导入正确的方向,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所以,人类的文化在没有达到大同之前,为了寻求最佳的文化模式,就不可能停止学术研究。人类的存在只要没有达到自在而自为的境地,就不可能停止哲学思考。对人类的文化积淀进行反思,推定文化的终极模式,“为生民立命”,“开万世之太平”,是学术研究应有的价值承诺。面对人类文化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决定了当代学术研究的多学科性。然而,由理性的基础所决定,首先应进行哲学方面的研究,使之能对人类的所有文化形式进行反思批判,从而建构普适性的人类哲学和文化模式,使人类的文明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显然,由人类厚重的历史及文化积淀所决定,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在比较哲学、比较科学和比较文化学等学理比较中进行深入探索。

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正确路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哲学体系的一以贯之,以保证对本体、主体和客体的正确认识;其二,文化模式符合人类的自然即自在的生存本质,自为和自在与主体的生命统一,实现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其三,理论模式的可操作性和持久性,即理论模式应当与社会历史实践统一。

显然,只有这样的文化模式才能称为人类文化的永恒之道,简

称“恒道”是也。中国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产生了“恒道”的理论形式,以为天下之常经。

“恒”在汉语中的意义,一般解释为“常”、“久”、“长”。《易》哲学表明,“恒”之所以能“常”、“久”、“长”者,生生恒其中也。“恒”之本体,为天地之“生生”(《恒·彖》),“恒”之所以能“恒”,恒中生生也。“恒”之主体,为神思用“中”,主体自为而自在恒中生生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传》),“神也者,妙万物而言者也”(《说卦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帛书老子》),是谓主体中和于恒中生生也。《易》推定的“恒道”表明,人的思想只有把握“中道”,才能把握三才之道的生生大化,从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思想体系论之,“恒道”是《易》的理论架构和思想理路的统一。因此,以“恒道”思想理论为基础,推定中国“恒道”文化体系,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基础性工作。显然,理解“恒道”理论,首要的是解读其哲学原理。

然而,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以西方哲学为座标的研究误区。学界论及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文化及哲学研究出现的代表性问题,是陷入西化误区必然发生的问题。如果把“合法性”问题一以贯之,那么,这即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这显然把反思推进到“西学东渐”之后产生的“全盘西化”问题,进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化的“合法性”问题,由此产生历史和逻辑的非统一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反思必然逻辑地论及中国文化的“恒道”,使“合法性”问题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得到解决。

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论之,中国文化暨中华民族究竟何去何从!如果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诞生了孔子、老子那样的思想家,在“轴心时期”创制了优秀的文化模式,然而,在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却在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这一历史和逻辑表明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这就是说,即使有孔、老这样的思想家,即使产生了辉煌的中国文化史,但是,中国文化却在对世界、对本体

化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模式,这是中国选择西方文化的理由之一。然而,这是忽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有些甚至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作出的选择。历史将表明,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选择,既有愧于先哲,更无颜于后世。在人类面对许多尖锐问题、面对西方文化模式带来的灾难面前,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理路,使人类的文明在符合人类生存本质的方向上发展,这既是历史的挑战,也是历史的机遇,我们当有所贡献。

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路决定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异化性质。由于受“全盘西化”的影响,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步入了西化的误区,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中国的“恒道”文化与哲学研究,是一个开拓性的学术进路,任重而道远。《恒道》辑刊肩负这一历史使命,将大力推进“恒道”文化与哲学研究。显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无论是《恒道》辑刊,还是学者队伍,都需要在长期的工作中,进行学术积累。因此,目前《恒道》辑刊的选题只能是有关对中国文化正本清源方面的内容。所以,举凡《易》学、儒学、道学、佛学、中医哲学及有关中西哲学、科学的反思而论及中国文化之“恒道”者,均为辑刊的选题。《恒道》辑刊以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努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建设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思想流派。

中国文化是否对人类存在具有本质性认识并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将决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这是中国文化是否可能复兴和是否有必要复兴的前提。虽然“恒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但是,由于在历史上造成的曲解,使之在当代人文环境中理解“恒道”,已十分困难。所以,在正本清源中追寻中国文化的“恒道”,这是《恒道》辑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中,将逐步明确中国文化的本质,从而建构以“恒道”为理论主体的中国文化体系。显然,距离这一目标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应当认为,“恒道”的本体论建构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恒道”性质。所以,从哲学角度论证中国文化的相关问题,将是《恒道》的中心内容。本辑的内容表明,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向前推进。

不理解西方文化,就不能在本质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我们绝不排斥西方文化中那些优秀的组成部分,借鉴西方文化的历史进路和思想理路,能够更好地推定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恒道》辑刊虽然以复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己任,然而,其思想理论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都要求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进路统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简单的“尊孔读经”,而是以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精神,以中国文化为本体,中和贯通人类所有的优秀文化,这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因此,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所有遗产,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化及哲学理性,使人类文化的“恒道”建构于坚实的理性反思中,是《恒道》承载的内容之一。面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国文化的正确的理性进路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中和贯通”。

思想理路只有与历史和逻辑统一,才能正确推定中国文化的“恒道”,从而在“中和贯通”的基础上,把人类文化导向“恒道”。这将是今后数代中国学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鞠 曦

2003年5月于长白山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的个性与人类性·····	胡海波(1)
中国哲学正本清源论要·····	鞠 曦(12)
中国哲学与后现代科学研究评述·····	王兴国 李迎春(24)
场与有:21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借镜·····	魏 冬(56)
场有与中道·····	韩 星(72)
场有哲学观的构建尝试·····	忱 天(95)
中国哲学:独行于“危”、“微”途中的智慧·····	高予远(105)

周易研究

谈《易经》若干问题的研究·····	曹福敬(117)
关于易学及“周易热”的反思·····	许林金鹤(132)
帛书《六十四卦》异文、卦画、卦序之管窥·····	胡志勇(140)
“形而上之道”说·····	郭 彧(152)
帛书易经卦名异称例析·····	谷 越(173)

文化研究

恒道与中国文化·····	赵定理(183)
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彭 华(205)
冲击与回应:以夷夏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王公伟(216)

“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	徐荟华 余达淮(228)
文化定义再探	牛龙菲(236)
中国养生诗探源	杨宏声(252)
《仪礼·丧服》所反映的上古婚姻家庭制度	丁 鼎(288)

儒学研究

《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梁 涛(316)
孔子仁学思想中的节欲观及其现实意义	王 焱(352)
《孟子》的分析	徐 山(358)
论哲学与宗教的超越观念	
——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黄玉顺(362)
“两行之理”与终极关怀	
——刘述先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姚才刚(378)
李翱“复性”说及其历史地位	谢丰泰(390)
“悬崖撒手”:王畿之学及其与王阳明“致良知”教的关系	
.....	任文利(399)

《中庸》是整体 中道有层次

——兼谈读解《中庸》文本的若干误区	丁润生(414)
-------------------------	----------

现代新儒家的现代化理论

——以“港台新儒家宣言”为中心——.....	[韩]张闰洙(423)
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	蓝 田(435)
五四自由主义反孔思潮辨析	王 锬(461)
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	
——以《四书》《五经》为中心	赵晓阳(482)

道学研究

《老子》的自然主义政治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李 刚(494)
道学的崛起对儒学复兴的启示	门 生(503)

道家视域与当代环境哲学视域的融合

——20 世纪西方对道家哲学特质的新认识 … 谢阳举(508)

段正元研究

道德为体 礼乐为用

——论段正元道德思想之体用 …… 韩绍正(515)

宗教研究

论科学与宗教的相容性和互补性

——兼论佛教与现代科学的若干一致性 …… 张一方(531)

老庄学说之宗教哲学精神解读 …… 杨 全(539)

也谈佛教哲学与佛教伦理的哲学基础

——与方立天教授商榷 …… 辛立洲(548)

如何评价冯友兰 …… 刘东超(557)

中国哲学、中医学与温病论治

——兼论“非典”之误 …… 鞠 曦(571)

祝贺《恒道》创刊出版 …… 赵定理(590)

后 记 …… (593)

中国哲学的个性与人类性

胡海波

一、走出“中西哲学”关系的误区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正在悄然地发生着从“专门性”研究向“普遍性”研究的转换。也就是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已不仅仅是属于特定领域的“专门性”问题，而是蕴含在整个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和“普遍性”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的思想前提和理论背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互为关联的事实：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哲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以西方文化与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有鉴于此，当代中国人要想保持自我，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能不去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文明，特别是彼此的哲学。

这样看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理论性质、思维特点、思想个性及其“长短”；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

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根据和标准为前提才能真正地比较研究“中西哲学”？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从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会以不同

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资源来回答这一问题;然而,无论是从何种视角触及这一问题,都应该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题、目的及其前提性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和自觉的意识。这不仅是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方向,也是我们反思以往人们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题、目的及其方式与方法的根据。

中国哲学界几代学者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成果上都是颇有建树的。然而迄今为止,复古的“中国化”与崇洋的“西方化”这两种“单一性”的思想倾向,一直都在困扰和影响着我们“中西哲学”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复古的“中国化”与崇洋的“西方化”这两种哲学倾向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与何种前提下形成的?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和扭转这种倾向?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亦是关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性质、方向和目的的前提性问题。

复古的“中国化”倾向,实质上是一种否定西方哲学的虚无主义与保守中国哲学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哲学观。拒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盲目自信是这种哲学倾向主要的思想前提。在这种哲学观看来,西方哲学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迫使它退出世界哲学中心,中国哲学取而代之的时代即将到来。这种思想倾向否定西方哲学对人类及其世界哲学特有的意义和价值的虚妄态度,不仅消解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也不可能真正发现和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性质、个性特征及其对人类与世界哲学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能切实地生成和保有中国哲学独立的自我。这种思想倾向主要存在于“港台”“新儒家”的观点中,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学界也有所传播、有所影响。

与复古的“中国化”倾向相比,崇洋的“西方化”倾向之影响与危害更为广泛和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在“港台”的“新生带”学者中普遍存在,“言必称西方”亦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的“主流话语”。这种“西方化”的倾向,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盲目崇拜西方的文明、文化以至于哲学,对中国的文明、

文化及其哲学丧失自信心,是这种哲学观的根本前提。在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以西方哲学的概念、逻辑、观点和理论为标准来比较中国哲学的范畴、思路、学说和思想。这种观念和方式使得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诸如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内容中国哲学有没有;中国哲学有哪些范畴和思想能与西方哲学相对应等问题上。从本质上看,这种研究思路的主题和目的是追求哲学的“西方化”,或者说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尺度与标准来认识、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把中国哲学“融合”到西方哲学中去。这实际上是在“中西哲学”没有平等地位,甚至是在置中国哲学于丧失独立性的前提下来比较“中西哲学”的,是没有发生“比较”的单一“西方哲学”的研究。这种事实上是在消解“比较”的思路和方法,不但远离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真实主题,不能达到进行比较研究的真正目的;而且势必导致以西方哲学“吃掉”中国哲学的后果。如此“比较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是应该质疑和反思的。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哲学追寻。要想真正地认识和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哲学,就应该真诚与谦恭地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哲学传统,正视自己的哲学与他人的哲学所具有的性质、特征与“长短”。这是我们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应有的理论态度和思想品格。然而,“复古”与“崇洋”的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足以令我们担心和忧虑。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念扭转这种倾向,其后果不仅是中国哲学没有希望,而且中国也是没有希望的。为此,我们应该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从哲学观上解决思维方式与价值倾向的根本问题。

二、理解中国哲学的“元问题”

“复古”与“崇洋”之哲学观的虚假性,关键在于其“前提”的不真实。

在哲学研究中,“前提”是生成思想的理论“根据”与“硬核”。

“前提”作为思想的根据在形式上是假设的,但这种“假设”作为“理论硬核”,却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前提”的这一性质和特点表明,它虽然是经过人们的思想假设的,但它却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因为“假设”的实质是人们有意识、有批判地对真实性的“选择”。也就是说,真正的前提源于人们主动自觉地对最为可靠的事实判断与选择。

作为基本的理论观点,“前提”在形式上是抽象的。然而,就像任何真正的理论在内容上都是具体的一样,真正的前提在内容上也必然是具体的。当然,前提的具体性不存在于“逻辑性”的概念体系,而是存在于“前提性”的根本问题中。

前提性问题是一些“原生性”的问题。思考这样的问题,根本的办法是“笨想”。所谓“笨想”,也就是“真想”,即面向事实本身追问真实之理的思想方法。倘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找到前提性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找到了事实本身的真实之理。其实,这些答案或真实之理的总和,也就是我们比较“中西哲学”之研究的“前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该深入地思考下述主要的“前提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在面对何种问题时才开始去比较研究“中西哲学”的?

这是一个蕴涵“命运性前提”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西哲学”之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人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进行真正意义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在此以前,虽然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彼此的哲学都有过一些了解,但就中国人而言,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比较彼此的哲学。因为在此以前,中国和西方的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以至于两种哲学,就总体而言是各自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的。因此,中国人没有对彼此的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和必要。

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开始去比较“中西哲学”的呢?这并不直接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这其中

根本的原因不在哲学里面,而是根源于中国人生存的危机和命运的不幸。那时,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攻击,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上暴露出致命的弱点,致使中华民族在内外交困中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与不幸命运。正是这种生存与命运的压力,促使中国人去审视中国与西方,在比较中研究西方与自己。

中国人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研究,其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是按照政治、经济、军事之比较,然后是文化之比较,再后是哲学之比较的次序进行的。这一次序表明两个事实:一是“中西哲学”之比较有着特定而深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绝不单纯是哲学研究自身的事情。二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从根本上比较中国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至于文化的重要层面和基本路径。由此看来,“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着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性问题的,就是从生存和命运的意义上来关怀着中国人的危机与前景的。这种情形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现实性,因为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无论是从过去还是从今天来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直接说来是哲学问题,但不仅仅是哲学的问题,尤其不是一个局限于哲学理论的“知识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何以一定要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这是一个蕴含“生命性前提”的问题。人如何认识、理解、把握和完善自身的生命,是人类世界全部文化与文明的根本问题。就哲学而言,这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存在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人能创造和生成自身的生命。人类生命的这一本性,是何种人有着何种生命、何种命运的终极根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需要通过哲学去认识和理解人性,以某种特有的方式自觉主动地生活,从而把握自身的生命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看来,哲学是人类用以安顿自身生命的学问。在这个判断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人与哲学之关系的双重内涵:从人来看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人有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以及何种命运,

就需要创造何种哲学;从哲学来看人,我们同样也会发现,人们拥有、信奉、创造何种哲学,他们的生活、生命以至于命运就会受到这种哲学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不仅要通过哲学反思生活、生命和命运,而且要反思哲学本身;不仅要反思自己的哲学,而且要反思与自己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密切相关的他人的哲学。这种以人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为核心与主题的哲学反思,其实质是真正地认识自己,深入地理解自己的生存方式及其问题,合理地改变自己的文化心理“成素”及其结构,从而升华自己的文化传统,获得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和掌握命运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

人与哲学关系的这个一般性道理,更为适合于中国人及其哲学。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历来多有危机、多有不幸;因此中国哲学也就以其特有的忧患意识强调“生命精神”,具有关怀生命体悟人生的特质。《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名言,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精神特质。就此而言,中国哲学在其本真的意义上是起于危机、效法天地、修持德性、内圣外王的生命哲学,具有个性特征。

这种哲学为中国人注入了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但就像任何一种哲学都注定要带有特定的片面性和缺陷一样,中国哲学也存在着过于“内求”、缺少“外展”的弊病。这一缺陷正是中国人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身处困境的精神根源。与此相反,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正是西方哲学的优势所在。这两种哲学内在的反差,构成了比较“中西哲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由此看来,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哲学来说,所谓“中西哲学”的比较,在其实质上是借鉴西方哲学来反思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批判传统的哲学,创造更为完善的中国哲学。

第三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对“中西哲学”的哪些内容进行比较研究?

这是一个体现“传统性前提”的问题。对于哲学来说,人的生命本性以及文化传统是全部哲学的基本根据或主要前提。人的生

命本性是哲学永恒的主题,是所有的哲学都要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哲学并不是以同样的面孔和眼光面对人的生命本性;恰恰相反,人们总是通过不同的哲学问题、解释原则、思维方式、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来把握自己的生命本性。这些“个性化”的哲学内容,是构成某一哲学传统最为主要的因素,从而也就形成了各种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特点。按照这个道理去感悟和理解“中西哲学”,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把握这两种哲学的性质、特点和“长短”。

西方人“惊异于世界”与中国人“注重于生命”的哲学问题;

西方人为世界秩序立法之“理”与中国人自己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取向;

西方人追寻“终极本体”与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原则;

西方人善于逻辑分析与中国人长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爱智”与中国人“修心”的哲学理念;

西方人概念明晰与中国人话语隐喻的哲学表达方式。

.....

“中西哲学”这六方面不同的性质与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中西哲学”各自的传统,是我们应该加以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各种具体内容尽可归结于其中。

当我们对以上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时,不仅要注意“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与特点,更要注重这两种哲学由于性质与特点的差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优长与缺陷,特别是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生命和命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四个问题: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比较和研究“中西哲学”?

在这个问题中,隐含着哲学观意义上的“思维性前提”。一般说来,在哲学中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一词,往往体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就某种哲学而言,思维方式是这种哲学在思维上总的特征与模式;另一种是就某种或某些哲学思想、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